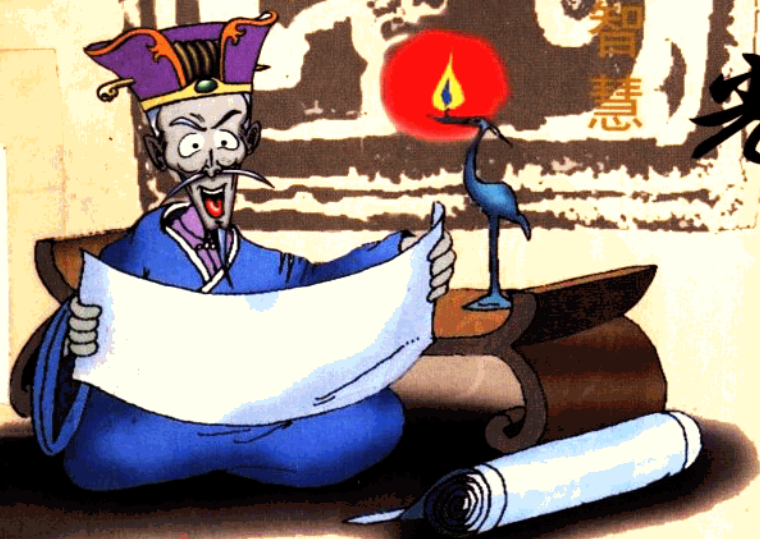


● 诸子百家智慧宝库

理性之光

荀子的智慧



四川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一、大动荡时代的理性思想家

- (1)
- (一) 分久必合的天下统一大趋势
..... (2)
- (二) 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10)
- (三) 荀子的生平和著作 (17)

二、凿破鸿蒙的唯物自然观 (23)

- (一) 自然的天 (23)
- (二) 天有常道 (28)
- (三) “天人相分”论 (30)
- (四) “制天命而用之” (32)
- (五) 无神论 (34)

三、石破天惊的性恶论 (40)

- (一) “性伪之分”与“性恶论”
..... (40)
- (二) “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
..... (46)
- (三) 社会和礼法起源论 (50)

四、富国富民的经济主张 (59)

(一) 欲望当相对满足	(60)
(二) 奖励和保护生产	(66)
(三) 重农抑工商之论	(70)
(四) 贫富差异是合理的	(73)
(五) 贸易使财货流通	(78)
(六) “开源”与“节流”	(81)

五、尊师重道的教育思想 (87)

(一) 教育可变恶为善	(87)
(二) 培养贤能之士	(93)
(三) 教学内容“突出礼”	(101)
(四) “教”与“学”的方法 ...	(105)
(五) 学习无止境	(109)
(六) 对教师的尊崇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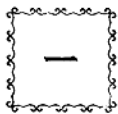
六、不拘一格的人才观 (115)

(一) “为政在人”的思想	(115)
(二) “王道”的理想国	(117)
(三) “尚贤”是君主之责	(124)
(四) 选拔人才的标准	(133)
(五) 取人有道，用人有法	(137)

七、君主专制集权的政治蓝图

.....	(142)
(一) 诸子的理想政制	(143)
(二) “法后王，一制度”	(150)
(三) “立君上之势”	(156)
(四) “隆礼”和“重法”	(163)

八、禁暴除害的军事思想	(173)
(一) 战争的目的	(174)
(二) 礼义为军队“本统”	(177)
(三) 唯物主义的军事观	(185)
(四) 统一天下的思想武器	(190)
九、富有特色的逻辑思想	(191)
(一) “正名”思想的提出	(191)
(二) “制名”的逻辑原则	(196)
(三) 对“三惑”的批判	(200)
(四) 逻辑的思维形式	(207)
(五) 由“类”而生的定义法	(213)
十、礼乐一致的文艺思想	(218)
(一) 文艺当为政治服务	(218)
(二) 文艺上的新探索	(222)
(三) “美善相乐”之论	(227)
(四) “美善同一”之论	(229)
十一、理性之光永存	(235)
(一) 荀子对诸子学说的批判 和总结	(235)
(二) 荀子学说的历史地位	(243)
后记	(248)
主要参考、引用文献书录	(249)



大动荡时代的 理性思想家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动荡空前剧烈，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方面都在深刻变革的时代，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昌盛繁荣。儒、墨、道、法等百家学派蜂起林立，争奇斗妍，竞领风骚；各派代表人物纷纷立说授徒，指点江山，相互诘难。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中国数千年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突兀的高峰。

诸子活跃的身姿，组成了当时学术文化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主要角色群；其异彩纷呈的学说，构成了古代东方最富魅力的智慧彩虹，不仅辉映着那个思想文化极其富丽灿烂的黄金时代，而且是此后中国古老文化长流不竭的源头活水，开采不尽的永恒宝藏，并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文化的轨迹和方向。

荀子，就是当时文化天幕上格外耀眼生辉的一颗明星。其学说广博精深，包罗宏富，方方面面均颇多创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中国上古最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是统一的君主集权理论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众所周知，中央集权

的君主专制成为秦以后通行的封建政体，直到本世纪初叶才被辛亥革命从形式上予以革除。

那么，荀子在分裂割据、战乱频烈的战国晚期首先提出这套政治理论，并经其学生韩非加以极端发展的历史原因何在呢？

（一）分久必合的天下统一大趋势

历史启示我们：问题的提出，通常总是在解决问题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或正在成熟，才有可能。从孔夫子到荀况、韩非，统一早已成诸子百家严肃思考和热烈论争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一时代的主题展开，犹如阵阵烈风，有力地鼓动着大一统的风帆。荀子之所以能够对先秦时代的哲学和思想文化首次作出系统深入的批判与总结，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身处那个在血泊硝烟、刀光剑影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统一的大时代前夜。他是华夏统一的鼓吹者，是用哲理来深沉地呼唤统一的杰出思想家。

以下从若干方面可以概要地分析统一大趋势的背景因素。

统一最根本的原因存在于社会经济领域。早在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及长江流域广大地带，即已进入原始农耕经济。但此后直至文明社会早期的夏、商、西周三代，由于金属农具迟迟未能取代石、骨、蚌、木制农具，

农业生产力低下，使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极其脆弱稀疏，统一缺乏广阔深厚的根基。因此，传世文献中夏、商、西周三代虽号称“统一”，实则其统一极其有限。

统一的真正深厚的经济基础，是在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牛耕的出现和逐渐推广而奠定的。

首先是农耕生活方式在空间范围内的大规模拓展。春秋时期，在黄河中下游等地与华夏农业区域犬牙交错，还存在着一些戎狄等少数民族的畜牧经济，到战国时期，已基本同化为农业经济。尽管北方的旱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仍有差异，但农耕经济已经首次大致“统一”了广大华夏地区。

其次，春秋以来，华夏列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改革，如齐国的“参其国而伍其鄙”、“相地而衰征”、晋国的“作爰田”、“作州兵”、鲁国的“初税亩”、郑国的“作丘赋”等，都是生产关系领域中由封建领主制转变为地主制，由劳役地租制转变为实物地租制的变法改制。到战国时期，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列国进一步改革，终于基本完成了上述转变，确立了私有制，并把过去农村公社束缚下的广大农业劳动者改造为个体小农，大批个体小农家庭遂成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从而与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一道，构成了封建性的农业生产关系。到荀子时代，封建性的生产关系已“统一”了华夏列国。

第三，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摆脱了村社束缚后，迸发出积极的生产热情。随着铁器牛耕的推行，产品较前大大丰

饶。农产品投放市场转为商品，使更多的手工业者得以出现。同时，铁器使手工业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由此也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商业是以横向流通为特质的经济，无论是商人在各地之间的辗转商贸，还是商品的流通本身，形成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各地区之间在经济这个最基础的社会层面上结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这就为统一的莅临打下了最深厚扎实的根基。

统一的另一深刻原因在于文化领域。

首先，在东亚大陆的腹心地带，经过长期的孕育，已经形成了作为主体民族的华夏族和作为主体文化的华夏文化。究其形成过程和原因，新石器时代以来东亚大陆居主导地位的农耕文化的长期发展，是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中原华夏文化的深厚根基。夏商时期的“统一”局面，尤其西周在空前广大地域内的大规模宗法分封活动，把当时居统治地位的文化模式传播于天下，并在周代形成了集中蕴涵华夏文化先进内核和基因的《诗》、《书》等文化元典。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天下分裂割据，各国各地文化的个性有所张扬，但却是在华夏文化共性的广阔深厚土壤上的生发，为华夏文化园地增添了异彩。

与此同时，文化传播的“统一”纽带虽出现了某种曲折，却并没有断裂，而是在各国各地区文化各具特征的繁荣表象背后继续顽强有力地伸张扩展着。如尊王攘夷，从春秋直到战国中期，一直是大国争霸的旗帜，它醒目地标示着华夏列

国在政治和文化上认同的强烈的“统一”精神。又如列国间的商业贸易、馈赠贡纳、人口迁徙、朝聘会盟、相互联姻以至战争掠夺本身，都是当时频繁的文化交流手段和渠道。当时的贵族都要研习用华夏文化的“统一”语言——雅言写成的《诗》、《书》等典籍，并在朝聘会盟等重要场合以这种共同的语言赋诗言志，以示认同。

因此，可以这样说，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风与雨、血与火的熔铸，华夏文化正在一个更高的境界中形成更具生命张力和内聚力的共同体。它以共同的语言、文字为集中标志，以血缘认同、尊祖敬宗等共同的价值观和心理素质为深刻底蕴，期待着新的统一整合，呼唤着大一统新局面的到来。

其次，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作为开放的共同体，不仅对内形成日益强大的内聚力，对外也辐射四方，以其不容置疑的先进性，对四裔产生了巨大的吸附作用，不断吸纳溶入大量的新鲜血液。

本来，先秦时期的戎狄蛮夷与华夏族，按当时华夏知识分子的观念和典籍记载，只是文化上风俗有别，实则同源异流，因此分而可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华夏精英的知识分子的此种观念，可谓深具历史见识，是华夏文化有容乃大的宽容精神和胸怀的生动体现。实际上，当时少数民族的称号，如戎狄蛮夷，并无贬义，其歧视意味乃是后世汉族主义的产物。

到战国晚期，昔日与华夏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尤其生活

在中原地区的部分，早已同华夏族融为一体，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其文化或为华夏文化所同化，或作为文化因子渗入华夏文化，为华夏文化增添了异彩，使之更见博大，更具活力。因此，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广大腹心地区广被的华夏文化，以及在这一共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心理状态，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厚巨大的共性，是东亚大陆大一统局面到来的又一成熟的重要历史条件。

大一统趋势的又一历史原因存在于社会政治领域。

西周王朝在天下统一推行宗法分封制，具体说即是由周王分封诸侯国，诸侯又在国内分封大夫。这种层层分封的政治制度，先秦文献称之为“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左传·桓公二年》）。周王是天下的共主，各国诸侯按等级秩序都在政治上服属于王室。据说还有定期朝见天子的制度，有领兵助王出征的义务；在经济上，各国要定期向王室交纳以土特产为主要品种的贡纳。可见，在西周时期，天下确实有形式上有过某种统一的局面。但是，这种统一还非常有限，诸侯国也不是王室下属的完全意义的政区。

首先，诸侯作为国君都是世袭的，与后世行政区划的长官完全由帝王任命罢免且有任期之制迥然不同，诸侯国内的官爵除上卿的封授须经天子外，其余均一概由诸侯封授。其次，诸侯拥有自己的军队，领兵助王出征并非定期之制，在天下秩序稳定时，此项义务更难落实。再者，根据传世及出土资料，各国对周王室的贡纳，一般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

义，主要起政治上服属象征作用。

由此可见，诸侯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享有很大的独立性，王室的共主地位，主要靠自身力量支撑，一旦势力衰微，即使还有宗法血缘认同的约束，各国的独立性也会膨胀，产生离心倾向，酿成分裂割据局面。因此，在西周“统一”的制度内，潜伏着分裂割据的矛盾和必然趋势，终于在西周末年，酿成了诸侯联合少数民族，举兵攻陷镐京，杀死周幽王，迫使王室东迁的惨祸。从此开始了诸侯割据，天下分裂的长期动荡局面。

春秋中期以后，尤其是进入战国以来，各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其中尤以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最为重要。改革就本质而言，是在国体上基本完成了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变；就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而言，则是基本完成了分封制及其相应的相对君权体制向中央集权专制君主体制的转变。在战国时代异常激烈的兼并战争背景下，改革的直接动机是要富国强兵，而其客观趋势则是促使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天下统一于新的君主专制集权体制下。

各国变法改制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举措，就是在新征服开拓的疆土上设立郡县，不再设置采邑，分封贵族。郡县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免，不再像昔日的封君那样可以世袭，郡县由此率先成为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行政区划，并逐步被推广到全国，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结构形式。与

之相应，以将相为首的官僚制度也建立起来，根据“量能而授官”的原则，由国君任免文武百官，完全改变了西周春秋时代世族垄断官爵的局面。官吏一般都以实物俸禄代替过去的采邑。作为旧制度残余的受封贵族，在其封邑中已无统治权，仅是食租税若干户而已，且不能长期世袭。官僚制度的确立，大大加强了君主专制政体。

刚刚建立起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当然还不够完善；但它针对着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的痼疾，能基本有效地实现封建国家在自身疆域范围内的统一，避免地方统治者的分裂割据倾向。随着战国后期兼并战争的激烈进行，各国疆域日益扩张，终于形成了齐、楚、燕、秦、韩、赵、魏七雄，实际上是七个疆域已颇为广阔的各自统一的国家，为其后秦汉统一王朝的政制提供了基本模式。因此，与西周分封制“统一”的外形下隐藏着必然导致分裂割据的矛盾相异，在战国末期七强并立的分裂表象下，历史已经在政治上完成了大一统王朝建立的制度准备。

这时，列国中谁政治改革最彻底，谁就能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的建立过程中走在最前面，迅速富国强兵，拥有最强大的实力，以武力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斗争最激烈的形式，是流血的政治，异常残酷的政治，是新的社会制度为自己扫除前进障碍的铁扫帚。战争给人民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和异常深重的灾难，但是，造成这种痛苦状况的真正原因是天下严重的

分裂割据局面。要想摆脱苦难，必须停息战乱，而要消除战乱，就必须消除导致战乱的祸根，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对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战争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

假如从道德评判的角度来看，当时惨烈的战争，固然应受到人们的诅咒谴责。然而站在历史主义的视角，它又带有统一战争的性质，顺应着时代的大趋势。结束分裂割据状态，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不但是统治阶级巩固和发展新的社会制度的需要，也是人民摆脱苦难的迫切需要，是当时代表历史潮流的知识精英认真思考探索的压倒性课题。针对老子主张回归原始村社状态，墨子憧憬夏禹之时，孔孟主张恢复周礼，荀子鲜明地主张法后王，实现封建大一统。

那么谁来执行和完成这一实现统一的使命呢？从战国晚期的形势看，秦国因为变法最彻底，其封建君主专制集权体制在列国中最为完备和先进，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力量都远远强于各国。荀子实地考察以后，认为秦国山川险固，“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吏治廉正，官僚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桀”；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军事上则拥有魏齐等强国之兵均不敌的“锐士”，因而赞叹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荀子·强国、议兵》，以下凡引《荀子》，均只注篇名）。强烈期望统一的荀子的这番褒许，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秦国之所以能够在群雄中崛起，最终完成大一统历史使命的深刻原因。

（二）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荀子理论建树活动的又一重要背景，是战国时期空前活跃的学术文化气氛和百家争鸣局面。

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有以下重要原因。

首先，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为知识分子了解观察世界，探讨宇宙人生、社会政治方方面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阶梯。随着新的封建地主制生产关系取代陈旧落后的封建领主制生产关系，广大农奴身份的村社成员转而成为国家授田制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有了提高。与此同时，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进步，从而大大增强了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农业生产的长足进步和巨大成就，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冶铁业、铸铜业、制盐业、漆器业、纺织业、制陶业、车船制造业等都有很大进步。行业种类增多，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水平提高。各国大量铸造货币，集中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根据荀子的记载，当时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丹干，东方的织物和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都出现在中原市场上。当时的大城市洛阳、大梁、阳翟、临淄、邯郸、陶、濮阳、郢、莒等，既是政治中心，又是著名的商业都会。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要求打破分裂割据局面带来的阻碍，而且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经

济联系的增强，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更深刻了，必然会促进科技和学术的发展。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无论是最古老的天文学，还是医学、农学、算学、物理学等，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甘石星经》为代表的天文学的发现启示人们，日月星辰各有运行规律，天也不是不可认识的神秘主宰。这些无疑为荀子“天行有常”、“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等著名的唯物主义观点，提供了科学认识的基础和依据。

农田水利技术的进步和农学理论上的成就，同样是诸子关注的重要对象。《吕氏春秋》的作者就曾乐观地记述：“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相比之下，荀子“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的看法，可能更切合实际。总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人口的繁衍增殖，加上教育的开放，这一切均为知识阶层的成长提供了较过去良好的社会条件。

商周以来流传的一些典册文献，作为上古对人文历史、宇宙自然的珍贵记载，也是在这一时期着手整理撰定，成为华夏文化的宝典。空前丰富的认识资料，明显加快的社会节奏乃至急遽莫测的风云变幻，特别是社会历史巨大深刻的沧桑变迁，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引起了强烈的思维兴奋和沉重的危机感，激发着人们探讨，不断迈向新的广度和深度。

战国时代社会的较前开放，是学术文化繁荣的又一重要

原因。

周代的宗法分封等级制度，是一种严重封闭的体制，严格地限制着社会的流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有社会成员都受到世袭等级身份制度的强大束缚。不仅贵族与平民之间身份界限神圣不可改变，而且贵族社会不同等级的身份及其相应的权利义务，也严格遵照宗法封建制度传袭。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正是此种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反映。

这种僵死的制度必然要被历史冲决。春秋时期，礼乐开始崩坏，宗法等级秩序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在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中，许多贵族遭到失败，坠氏亡命，降在皂隶，甚至一些诸侯也亡国灭宗，祖先血食不继，子孙沦为庶人。与此同时，“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僭礼越轨现象不断发生。到战国时代，旧的分封体制已被日益排挤到一边，世袭制被打破，贵族中较低下者不仅可以通过军功在爵禄仕途上跃迁，而且可以凭其政见和游说干政，以至位极人臣，其中像申不害、蔺相如等甚至是地位低微的平民出身。社会统治的阶级基础在这种较前流动开放的格局中拓宽加厚。与此相应，教育也从官府垄断向民间开放。“有教无类”使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人也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既为社会政治机体输送了人才，又传播了文化。

另外，战国时代的分裂局面，战争的空前规模巨大和惨烈，由此产生的保卫疆域社稷的迫切需要，兼并土地以至统

一天下的政治野心，都促使统治者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们广揽人才，甚至有意提供良好的条件让知识分子来研讨以治理社会、富国强兵、统一天下为中心，兼及宇宙人生的大政方略、学术问题。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这样一个著名的官方学术机构，以各派优秀人才云集著称。

此外，一些国家的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如著名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也深知网罗人才的重要性，大养宾客，广收有志之士。一时间落魄潦倒，入仕无门，身怀技艺的士人，获得了探研学术，接近统治者并与之讨论国家大政、国计民生的机会。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走向仕途以至权力高峰的。应当说，这是古代少有的一种相当活跃而流动开放的人才机制，为战国社会增添了难以估计的活力。

当时，社会制度正处在转型时期，阶级、阶层关系异常复杂，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诸子百家分别作为它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代表，出于本阶级、阶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对上自天文地理，下至社会人事的世间万象纷纷作出解释，提出主张，由此形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中“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拿荀子的话来说，就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百家异说”既是动荡时代分裂局面下的产物，本质上又是大一统历史趋势的反映，并且是对这一趋势推波助澜的重要力量。

诸子百家中，主要有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